



【张楚廷教育文集】²⁹

院校论

张楚廷 著

YUANXIAOLUN

每一所大学，都可以是一座文化堡垒。
而这座堡垒的铜墙铁壁正是深深烙印在大学身上的理想与信念。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楚廷教育文集】②⑧

院校论

YUANXIAOLUN

张楚廷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院校论 / 张楚廷著.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张楚廷教育文集)

ISBN 978-7-5621-7395-3

I. ①院…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管理-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083843号

【张楚廷教育文集】②⑧

院校论

张楚廷 著

责任编辑: 雷 刚

文字编辑: 高 攀

封面设计: 尚品视觉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3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3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 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21-7395-3

定 价: 24.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我的教育文集已出版了 20 卷，其中包含了 50 多本著作，每卷都不止一本著作，故篇幅都比较大。从第 21 卷起，将不再搞那种大部头了，不必太沉了。

第 21 卷之后的各卷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那里有我的好朋友靳玉乐，又有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以及责任编辑的支持。

在这个总序里，恐怕不宜一卷一卷地介绍了，我就做一点概括的举例式的说明吧。

第 21 卷的书名是《思想的流淌》。就这个书名，我曾与周成名教授讨论过。当初，曾取名《流淌着的思想》，他说这个名字长了点，于是我就改为《思想的流淌》。他又说，就叫作《流淌》吧，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本文学著作的书名。

顾名思义，《思想的流淌》写的是思想，主要是我本人的思想，又主要是教育思想。由于一辈子从事教育，我的思想很难离开教育背景，何况，这个背景也足够宽广，不是一泻千里、笔直流下来的，而是弯弯曲曲、波浪起伏的。

读过我的电子稿的学者说，这是一部思想传记。但我没打算写传记，即使是思想传记也不会去写。我的《思想的流淌》并不是按时间顺序顺水而下的。

辛继湘博士在读完了此书的电子稿后，说书中有 3409 个“人”字，还有数以千计的问号。她从统计的角度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本书是写人的，不仅仅是写我一个人；第二，学问是由问题引出的，众多的问题被发现、被提出，又被作某种阐述和回答，这就是学问，就可构成一本相关的著作。

不只是这一本书，我的著作很多研究生都读过，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每一本都通篇见人。至于我自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写着人。我相信，谁也不可能把“人是什么”完全写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题目。但是，似乎如此渺茫的课题，却总是有人做着，不指望找到终极答案，却准备永远地做下去。其中，或许有人，特别是某些哲学家很可能认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答案。这是哲学家们的性格，他们相信终极的结论就在他们笔下。

我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哲思，但称得上哲学的共有十本。除了《课程与教学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通论》这四本是以教育为背景外，另有《哲学是什么》《哲学原理》《人哲学》《人是美的存在》《人论》《论我》等六本。

尽管有人称我为哲学家，但我真的认为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做到“家”，我还不是哲学家。因而，我也不可能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已经把人的问题全都讲清楚了。我只是一个在这一永恒题目面前将永远走下去的人之一。

《人是美的存在》是我多年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总算如愿了。可惜，我的美学修养还不够，也就还不足以把这个题目写好，只能是尽我所能吧。

《人论》是近几年来一直酝酿着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现在终于也写成了。

从某个角度看，我的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国学者写过的，我也写，当然我力求写得不同；第二类是外国学者写过的，作为中国学术工作者，我想站在更高处做同类学问；第三种情形是中外学者都没写过的，我也写了一点，例如课程哲学。对于第二类，如高等教育哲学，我已经做得比美国学者更深入了，而在中国尚无其他人做。

如果以已出版的著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在一个学科领域里有过研究的话，那么，我在八个领域里活动过、研究过。这八个领域分别是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文学、体育学、高等教育学。我的诗集已出版了四本，至少还会出几本，这大概属于文学吧。我的著作《体育与人》属于体育学，涉及广泛的体育项目以及运动员等。

在各卷之中，都会有前言或序，分别作更具体的介绍，这里仅仅是概括地叙述一下。

我不能不再三地感谢给了我许多帮助的曾力平、柏才丽。他们大大加速

了出版的进程，节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让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些著作出版时，我尤其怀念我的父母，怀念他们无限的恩惠，我亦谨以这些著作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我的《漫漫人生路》以及其他篇章中，都叙述过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从父母到我们的先祖，再到我们的民族，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我向他们鞠躬、叩头、跪拜，用我的无限虔诚与奋发努力来感恩上天和大地。

不少研究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如做校对工作的，有高飞、肖维、李学兵、伍远文、文兰芳、上官剑、常思亮、李学、马卫平、段慧兰、曾维华、李海萍、李碧红等人；有少部分资料的查证工作，则由孙华、刘晶、刘阳科、沈又红、周光礼、刘宇文、方明军等人协助完成。还有众多的学界好友给过我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这一信条，是我全部生活之所依，当然也构成我读书、教书、写书的动力源泉。

张楚廷

2014年11月5日

前言

院校者，高等院校也。大学只是高等院校的一部分。本书曾命名为《大学论》，后来觉得《院校论》这个名字更贴切一些。

从读大学到工作，再到今天，已经60年了。经历了60年的大学生活，如果对于大学是什么还说不出几句话来，就可能太迟钝了。

当然，这未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一个人活了80岁、90岁，对于人是什么未必就能说出多少见解来。

但我想，如果一个人自觉其人并努力做人，总是能够有所心得的。

我现在比较自觉了吗？至少，我已在自觉的感悟之中。宽泛一点说，关于高等教育，我可能已写下了数百篇论文，著作也不少了。例如，《高等教育学导论》《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通论》（后两本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从写作内容到论述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大学教学学》《学校管理学》《大学人文精神构架》等。

以上列举的著作都属于系统的论述，然而，眼下这本《院校论》则是有关论文的汇集。每一篇也许有一定系统性，也还都是论述高等院校的，但整体上并非系统的专门著作。

当然，这些论文是近些年写成的，论述内容与大学的现实关系仍是比较密切的。

目 录

我们变革什么	/ 001
教育学与大学	/ 007
学校里的民主问题	/ 011
大学美育的价值	/ 020
教育研究中的美学动因	/ 022
人文学科对于大学的意义	/ 031
大学是什么	/ 039
论大学的校名	/ 046
教育之美何在	/ 052
关于大学教学的若干问题	/ 056
高等教育演绎趋势	/ 060
再论大学的使命	/ 063
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问题	/ 068
十问“理论联系实际”	/ 071
大学文化与传统	/ 076
为什么教育家多出在中小学	/ 084
你的学校刮着怎样的风	/ 087
关于校长的学问	/ 090
大学之大与大学之高	/ 107
大学的八大特征	/ 112
大学去行政化的困难何在	/ 118
评布鲁贝克的“中心论”	/ 122

医学教育与本科教育发展	/ 127
故事在教学中的作用	/ 130
有关高等教育哲学的几个问题	/ 135
教师与教育哲学	/ 142
教与学的非对称性	/ 147

我们变革什么

现在很多学人都在讨论高等教育变革的问题。

实际上，关于这个论题，还有一些前提性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变革？是什么让大学想到了变革？我们希望变革什么？我们能够变革什么？我们不能变革什么？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变革？还有没有我们想变却变不了的？还有没有不必去变的？大学总是需要变来变去吗？大学是多一些变革好，还是少一些变革好？

变者，改也。所以，变革就是改革，改革也就是变革。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十多个问题就都可以转移到改革上来。现在，我们只在这十几个问题之中，特别讨论一下我们变革什么问题。

(一)

大家本来是求发展、求进步的，为什么要去寻求变革呢？因为发展常常会遇到障碍和阻力，所以需要去克服和排除，这就是变革。不变革就会停滞，就发展不了。

我们总想寻求美好，为什么寻求美好也需要变革呢？因为现实中有些方面并不那样美，更谈不上好。排除丑陋，清扫污秽，才会更美好。因而，求美好就需要变革。

也许，现实尚好，但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好；或许，现实中障碍并不大，但我们总想更顺畅，于是，我们需要变革。变革似乎是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然而，有时候是需要回首过往的，因为现在并不好，反而是过去很好。这时，变革就是回归，就要走走回头路。实际上，变革者心中存有一个尺度，知道改到哪里去，朝着何方走。

于是，变革可能是向前，也可能是回归。如果大学的本来面貌丧失了，就需要变革，需要回头去寻找。

这样，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变革，变革似乎成了永恒。确实如此，或求发展，或求回归，或求美好，或求更好，都是不同意义的变革。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变革也就成了永远的旋律。

关键关于变革，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比较清醒，要有更高的自觉去关注和投身变革。

(二)

什么是大学与大学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呢？江汉大学是大学，湖南大学是大学，长江大学是大学，这算是对什么是大学的某种回答。

大学是什么？这是回答起来相对困难一点的问题。长久以来，有许多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但是，没有人认为找到了最终答案，即使是雅斯贝尔斯这样的智者，也不是这一问题的终结者。

许多人不直接回答大学是什么，而去回答大学做了些什么，并认为大学做什么，大学就是什么。洪堡对这一问题有过回答，纽曼有过，查尔斯·范海斯有过，博克、克拉克、赫钦斯等学者也都有过。

然而，总有人作更深层的回答，比如梅贻琦就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但也有人在大学建校百周年的时候，着重陈述自己大学培养了多少高官。于是对大学是什么的回答有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大学，乃大官之谓也”。如果对这种新的说法不满意，那就要回到梅贻琦那里去。这是回归，也是变革，变到大学的本来面貌上去。

还有人说：“大学，乃大爱之谓也。”这可能是画蛇添足，没有大师，哪来大爱？有了大师，何愁没有大爱？

画蛇添足是不是变革？也许称之为变异更恰当。变革必求异，但并非变异就能称得上变革。求变，求改，求异，都还需要问一问：变到哪里去？异从何方来？异中有没有新意？有没有实质性的变革？

大学可不可以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可不可以举着真理至上的旗帜？

不是还有民族至上这面旗帜需要高高举起吗？然而，追求真理必是有利于民族的。因而，真理至上与民族至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让这两面旗帜都十分鲜艳，都在大学校园里高高飘扬。

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国中之国，大学是民族的，又是超民族的。”他对大学、民族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作了准确的、辩证的分析。

这件事似乎说明大学里应当有哲学家来和我们一起思考，或者说，大学本身就应当有哲学家，否则大学就不太像大学。因此，大学也就还需要变革，让大学成为大学本身。

眼下，从整体来看，我们更为缺乏的可能正好是理论兴趣、哲学兴趣。所以，这也正说明我们的大学确实需要变革自己。

大学本身就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即使是应用学科，也少不了理论支撑。正如赫钦斯所说：“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大学还会没有思辨、

没有理论兴趣吗？可是，这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所特别缺乏的恰恰是理论兴趣，以及对理论再论理的兴趣。

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真正称得上一流的大学，它们无不拥有高水平的形而上研究。否则，它们也就不可能称之为一流大学。

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特别能说明这一问题。他们国家的全面繁荣正是全面变革的结果，而大学在这种全面繁荣和全面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流的哲学在哪里？一流的大学在哪里？一流的社会繁荣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最深刻的变革在哪里的问题几乎是同时存在的。

人们说，大学是众多智慧的头脑相互碰撞的地方。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智慧，二是碰撞。

越碰撞，越智慧。并且，智慧者大都喜爱碰撞。所谓碰撞，就是相互的切磋、质疑与反驳。因而，我们的变革需要有利于智慧的生成，需要有利于碰撞的形成，在智慧的碰撞中，促进大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

我们确实不只是思考大学应该做些什么，还需要思考大学应想些什么。不仅要思考什么是大学，而且要思考大学是什么。

以上所言，都是观念上的变革。并且，我深信，这的确是我们大学所需要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现在来谈论另一类变革，虽然这些变革与观念有关，但并非单纯是观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三条原理。

1. 大学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
2. 大学与政府彼此独立，各自平行地服务于国家。
3. 大学机构与政府机构在性质、内容和构成上都是不同的。

好的政府必然忠于国家，并在不干预大学的同时，代表国家从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大学应有的支持。

好的大学必然忠于国家，并在保持自身对政府独立关系的同时，以批判的方式帮助政府，以自身的良知帮助政府不偏离国家的根本利益。

有些大学可能是某届政府办起来的，但这只能说明该政府代表了国家的某种意志，而不能构成大学可以依附于政府的任何理由。

某些政府可能很看重大学并给予大学有力的支持，然而，按照同样的道理，政府也不能因此而有干预大学的权力。在这一点上，19世纪的德国做得

非常成功。并且，德国大学的独立与繁荣带来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繁荣。

大学的独立是大学的绝对观念。因而，对明智的政府而言，尊重大学的独立性几乎也是它们的绝对观念，并努力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的独立。保障大学的独立才算是保障了国家利益。

好的政府是喜欢大学批判自己的。事实上，政府很难不需要“清洁工”，而大学正是最好的“清洁工”。政府若能充分保障和尊重大学的清洁工身份，它们之间就可能有一个健康而融洽的关系。

政府与大学所行使的职能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各自的机构及其性质也应当是很不相同的。

比如说，政府里面必定有官员，有省长、部长、市长、县长。然而，大学里面就必定不能有官员。

校长不是官员，院长不是官员，系主任也不是官员。校长是学术组织者，是教师的首席。如果把副部级、厅局级、司局级之类的头衔加在校长头上，那就是不伦不类，那就是多此一举，并且是严重损害大学发展的多此一举。

有学院的院长问我，他是什么级别？我回答说：“院长就是院长级。”当然，校长也就只是校长级，没有别的级别，也无须别的什么级别。

大学本无官员，如果一时错给了官级，就需要及时去掉，越快越好，这叫作“去官化”，以还原大学的自我。这当然是变革。可以说，我在任大学行政负责人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去官化”的历史责任，至少在一个根本上，我这样理解了大学。

可能还需提到大学内部体制的变革。内部体制需要多大程度的变革和什么性质的变革，我想这是因地制宜、因校而异的。

大学内部的变革也涉及许多方面。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大学的两条命脉。大学自治主要涉及外部问题，而学术自由主要还是大学内部的事，尽管外部环境也会对学术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简要地谈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二是内部管理体制。

对于管理体制问题，我想指出，我在学校管理工作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其中有十年任党委书记。这十年当中我一直把自己视为董事会或相当于董事会的机构的代表，全力支持但坚决不干预校长的事务。

对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我认为，作为校长，主要是行使行政权力，虽然自己也有学术身份，但主要代表了行政权力。

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对于学术权力，我对自己约法三章。第一，绝对

不介入、不干预学术权力；第二，明确区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线；第三，维护和保障学术权力的独立性。

在具体工作安排上，所有校长、副校长等行政人员都不得在学术委员会任职，更不能兼任学位委员会主席。事实上，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在我任职期间，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主席都是由无任何行政职务的教授担任的。教学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也是如此。

我深信，最高水平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也很可能是最高水平的大学。

我任校长期间，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最自由的大学，二是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最自信的大学。我在任职时间里，一直为此而努力。

从外部环境来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学变革潮流帮助了我，而我则用行动回答了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并实践了我对大学的感悟。

在我看来，追求真理和追求自由是大学永远不变的精神依托，在这一点上，大学可以为自己的保守而骄傲。大学变革所需要的是革除阻碍或异化大学精神的观念和体制。也可以说，大学在不变中求变，在变革中维护自己不变的神圣理想。

科学技术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技术喜欢现代化。然而，要谨慎提及所谓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对于人，我们特别需要回到孔子那里去，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科学的最高使命是现代化，而教育的最高使命是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两方面，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生活方式、事业追求可以千姿百态，然而，做人需要一个共同的尺度。即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服务他人、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为什么无不拥有强大的人文学科？因为，对于科学技术而言，起引领作用的一定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守护着我们古老文化的人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变的千古训条引导着变化与发展。

（四）

华中科技大学曾经有一位杰出的校长说道：“只要我们的上司有三年不管我们，我们就可以腾飞起来。”三年，这似乎不算是苛求，可是现实更为严峻。

客观地说，教育行政当局也有十分明智的人员，也有没有忘记大学本性的官员，他们很想保障大学的自由与独立。然而，体制约束了他们，让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大学进行多方面的管控。

大学有足够的智慧管理自己，而且必须让大学自己管理自己，这几乎是

全世界的共识。大学变革其实很简单，只要无人再去管大学，大学就会繁荣。因此，我们盼望社会有更深刻的体制变革，并且期待这种盼望不会变得遥不可及。

更为现实的是，作为大学使命的承担者，只能是一边期待，一边行动。当然，这很艰难，也更需要智慧。但是，大学正是为智慧而生，为艰难而生的。

大家都在谈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如果没有包括教育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变革，不仅没有世界一流，恐怕连亚洲一流也是十分困难的。这称不上是什么预言，却包含着一个难以违抗的逻辑。当我们以复杂的心情提及这种逻辑的时候，我们所深切期待的是大学的真正繁荣，并以这种繁荣助推中华民族的全面繁荣。这不是大学的大气，而是大学本应有的历史使命和豪情壮志。

教育学与大学

首先说一下大学、教育和哲学的历史。教育有多长的历史呢？大学有多长的历史呢？哲学有多长的历史呢？谁的历史最悠久，是哲学、教育，还是大学？

教育确实是历史最悠久的。可以说，教育的历史跟人类历史是一样早的。人类文明史已有 7000 年，人类史 500 万年（这一时间是经过考古学证明的）。事实上，在文字出现以前就有了教育，所以教育的历史最悠久。

哲学是其次。那哲学存在多久了呢？古希腊是一个充满神话世界，它达到了智慧的高峰，直到现在这个高峰还很难超越。它的神话中就包含它的哲学，所以，哲学的历史是以古希腊为标志的。2500 多年前苏格拉底诞生，23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诞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在西方，如美国的一些大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必读书。

大学有多久的历史了？大学只有 900 多年。大学是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标志。最早是博洛尼亚大学，其次是巴黎大学，建立在大约 900 年前。书院虽有 1000 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书院不叫作大学，它也不具有大学的某些特征，所以书院不能被认为是大学产生的历史。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中国的大学以 1896 年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的诞生为标志，到现在也就 120 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曾经是一个国力非常强盛、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在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衰落，晚清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才使得中国日渐落后。为什么大学不产生在经济发达的中国，而产生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教育的学问叫教育学，关于大学教育的学问叫高等教育学，还有一门是哲学。追溯这三门学问的历史，最早产生的是哲学，因为哲学约有 2500 年的历史。

教育学产生时间，一般世界上公认的是 1623 年，即 17 世纪以后才有教育学。也就是说，哲学产生之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了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这就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历史最悠久，

其次是哲学，再次是高等教育学。关于它们的学问产生历史也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教育学这门学科大都在师范院校设立。也有综合性大学设置教育学院的，比如北大。高等教育学，最强的不在师范院校，而在综合性大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主要在综合性大学，并且主要在三所综合性大学。第一所是厦门大学，第二所是华中科技大学，第三所是北京大学。

欧洲的古典大学里面教育学产生得很晚。古典大学在中世纪早期只有四大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而教育学实际上产生于17世纪，所以，四大学院里面当然就不包括教育学院。

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厉害，它最强大的大学几乎全是综合性大学。这些学校教育学也很强大，因为美国很多综合性大学的前身就是师范院校。

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教育学院也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有杜威，这是所谓的“英雄造时势”吧。因为杜威的存在，使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变得特别有名。

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是哪一所大学？答案是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它应该是最老的。而芝加哥大学是1891年诞生的，1891年意味着什么呢？北京大学是1898年诞生的，就是说芝加哥大学只比北京大学早了7年。可是芝加哥大学，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就已牢固地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北京大学曾经是亚洲绝对一流的大学，也是水平非常高的大学，但如今北京大学却在衰退。

北大校长中最著名的是蔡元培，然后有傅斯年、胡适等人，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师。那时北大是鼎盛时期，从此以后，北大自己都讲我们再没有出过那么好的校长了。

很多时候不是你钱多就会成为世界一流的。曾经有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些业内人物在一起议论，认为美国大学的水平高是因为美国人有钱。美国人立即驳斥说：“你们错了，我们大学高水平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最高水平的大学就是最自由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也会成为最高水平的大学。

19世纪末期，美国当时还比较落后，他们就向德国学习，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奥特就努力学习德国的办学经验。

德国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但是它的大学却是非常自由的。它的大学跟政府之间有着一定的默契，那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扶持大学，但绝对不限制大学自由。美国大学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吸取了这一经验。

我做大学校长的时候，目标之一是让湖南师范大学成为一所自由的大